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中國人民大學
新聞學院藏稀見

民國新聞
史料彙編



方漢奇 王潤澤 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英)安傑爾 著 張友松 譯

新聞事業與社會組織

北京北新書局發行，民國十六年（1927）鉛印本

第十一冊目錄

新聞事業與社會組織	一
新聞紙研究	一六九
新中國新聞論	四〇五

新聞事業與社會組織

北新書局

新聞事業與社會組織

序言

這本書的前面一部分是就新聞業與社會的普通關係討論討論；無論那一種社會，如果要避免道德的漸漸降落，要越來越增加牠的自治能力，成爲有價值的社會，便有種種問題必須應付，必須解決，本書所討論的問題也就是其中之一。

後面的一部分討論這個問題，是特別以勞工運動的眼光來討論，如果工黨政府出來執政的時候，牠所要應付的種種特別難題之中，這就是一種。這書的後面一部分包含着幾種具體的提議，其中所擬的辦法都是一個比較我們現在所組成的社會更社會化的社會關於新聞業問題可以採用的。

我說『社會化的』而不說『社會主義的』，爲的是不願出了這本小書的範圍來討論各種關於政治或經濟改造的互相衝突的理論或學說，或是嚴格的依照任何一種社會主義

的原則討論社會進化的問題——無論是國家社會主義，幾爾特社會主義，改良派社會主義，革命的社會主義，議會制的社會主義，或是共產的社會主義。作者在這裏關於未來的發展所假定的只有兩點：第一，人類越明瞭他們那些社會的危機，他們便將要越加團結的努力，力求支配社會實力以達避免那些危機的目的；其次呢，工人勢力的比較增加，譬如我們那有組織的勞工運動的勢力之增加，必是由於勞工努力將經濟勢力從資本家轉移到工人自身的結果。所謂『自治』除此以外便沒有多少意義了。

這兩種假定都是認為我們對於新聞業切不可專持那商業性質的一味圖利的態度。現在大家的見解都認為所謂『公家的言論機關』是一種公家的事業，這種社會勢力也許要成爲一種社會的危機，須要大家自覺的聯合起來管理纔行。要實現這種聯合的管理，却不可仍舊回復當初那種政府檢查的辦法，這也就是本書所討論的問題之一。至

於第一點關於勞工運動的將來所設的假定呢，工人要想取得議會中的勢力，只要把新
自覺完全在少數大資本家動手裏變足以使被壓上層勞動者利益均等；

這是舊的消遣的工具，舊報紙之選擇，事實之披露，都是由管理新聞業的人一手包辦的，大家決定他們對於各種問題的意見和政策，便是根據他們從新聞方面得來的知識，這種工具若是全留在少數資本家手中，他們是和其他的資本家緊緊的互相結合的，勞工怎麼能不為他們所制呢？若是那樣，工人取得了政治勢力，纔知道真正支配社會（包括政治）的勢力原來還在政治之外。勞工雖然可以組成政府，但是結果必是造成政府和打倒政府的勢力終究還是在勞工階級以外的人手中。勞工越想應付這種局面，便非有種種努力不可，本書後半所論的便是這一點。

讀這本書的人只要是沒有偏見，或是肯加思索，一定不會認為作者的用意是要攻擊新聞事業或是攻擊某某辦報的人。（本書作者正是作過二十年的記者和報館經理的。）下文是要說明新聞記者和報館主人雖則都願意完全獨立，却都受着幾種外力的支配；這些外力常使報紙起一種作惡的反社會的作用。書中那些具體提議的目的便是在於改良那種情形，並且在這一方面提高一般從事新聞業的人的地位。

目錄

序言

第一章	根本問題.....	一
第二章	新聞事業與民衆心理.....	一二
第三章	新聞事業與舊社會制度.....	四五
第四章	資本主義，平民主義與新聞事業.....	六三
第五章	現今制度之下可以實現的改良方法.....	八九
第六章	勞工政府與資本主義的新聞業.....	一〇八
第七章	工人如何纔能取得辦報的地位.....	一一六

新聞事業與社會組織

第一章 根本問題

在一種社會化的社會制度之下，國家之管有街道，暗溝，道路，橋梁，鐵路，煤氣，電氣，鑛產，土地或資本，究竟應該取什麼方式，到什麼程度，這是討論一種進步的社會組織的時候所常談到的。但是適用於討論那些問題的時候的見解，對於一個人口稠密的工業化的社會裏的新聞業問題，却大部分不能適用。國家與新聞紙的主要關係不在於直接意義的經濟作用，換句話說，就是不在於新聞紙是一種產業或生「財」的工具——這都是次要的。社會上的人之得着種種事情的消息來決定社會全體對於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的方針，事實上便全靠新聞紙為惟一的工具，這個問題的重要便在這點。報紙便是社會上一切事情的公證人，現今進化的人類日常的判斷大體就是以牠

爲根據。在現今這種社會裏，大家的見聞遍及全世界——在這種非常發達的社會裏，公衆的意見關係極大，譬如在德里都布林和柏林這等地方，地道電車裏和公事房裏茶館裏那些只看一看報紙上的提綱的忙碌無暇的人們急急忙忙所下的判斷便等於決定或或戰那類大事的法律——在這種社會裏，新聞業縱或不是社會的講經台和裁判所，也可說是牠的耳目，尤其是逢着危急的時候。

這一種產業的問題和其他各種之不同，便是因爲牠最近的歷史上有一種特點。關於道路，橋梁，水，電報這些事情，都顯然有一種社會的需要表明牠們定要一步一步的漸漸歸國家所有；這種方向是從私人管理變爲公家管理。關於流傳印刷文字的新聞紙呢，社會的需要正向一種相反的趨勢：從公家管理——國家支配——變爲私人的自由（註）。我們的祖先力爭新聞業的解放，擺脫國家的管理，這是爭自由的奮鬥中很顯著的一部分。我們的祖先認爲只要不受拮制，能出充量的廉價報紙，便是普通的自由和啟發知識的法門；現在我們知道這種『自由的言論機關』已經成了發展自治能力的許

多最大障礙之一，甚至於是現代民治的危機之中最大的一種——這便是純粹政治的民治精神的覺悟之一。舊社會所認為革命的工具和牠所最怕的東西事實上已經變成妨碍任何趨向新社會組織的實際運動的最大阻力了。

(註)一六六二年的新聞律那類東西自十八世紀的初年以後雖則已經不見實行，政府管理的痕跡却一直到一八五三年取消新聞紙稅和廣告稅和一八六一年取消報紙印花稅之後纔算沒有了。早年限制新聞紙勢力的方法是實行「官准出版憑照」和給予專辦權的辦法。克倫威爾的時代新聞界所受的痛苦較之『星法院』(Star-Chamber，英王查理士第一時代取消的，以殘暴著名。)的時代還要厲害，但是最厲害的時期要算『復位政府』時代，那時候專門以揭發『誹謗和邪說』為事的羅傑·黎士崙治氏受了政府的特任，作新聞紙檢查官。當時官家的態度很可以拿這位先生有一次所發表的意見代表出來。他說：『我大胆的說……即令新聞界能守規矩，人民的頭腦也清楚，肯問一問哪是新聞哪不是新聞，我對於這種專業也還是不贊成的，因為有了新